

第一章 西汉再建帝业的道路 ——儒术兴起的历史背景

秦朝灭亡后，法家受到批判，但儒家学说并未立即取而代之成为汉朝的正统学说。这不仅是因为汉初统治者不好儒术，也是因为西汉再建帝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作为陈胜、吴广发起的那场反秦战争的产物，汉朝的建立固然意味着对秦朝的否定，但汉朝是承秦而立的，在制度和政策上又大量继承了秦朝的传统。于是在汉初政治中，“反秦”与“承秦”形成一对矛盾，其中“承秦”又占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汉初统治者在秦朝的老路上一步步向前迈进。虽小心谨慎，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历史再次证明秦朝的道路走不通。于是，儒家学者为摆脱汉初政治之困境而设计的改革方案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导致儒术的兴起。

下面，我们将对这一过程的几个要点，即区域文化的差异对秦朝灭亡的影响、汉朝承秦而立的原因和意义、汉初东方政策的形成和变化、黄老无为之术与儒家更化之说的兴替等，进行描述和分析。

第一节 取守异术与亡秦必楚

秦政和汉政是前后衔接的。秦政成功的经验为汉政所继承，秦政失败的教训也为汉政所吸取。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朝摔倒的地方便是汉朝继续前进的起点。那么，汉初的人们是怎样认识秦政之失的？关于这一点，秦末流行的“亡秦必楚”之说和汉初儒家学者的“取守异术”之说都有重要意义。

这两种说法是人们熟知的，学界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仍有未尽之处。笔者从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这一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这两种说法和秦汉之际的历史，发现秦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完成了对六国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后，未能成功地实现对六国旧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统一。秦朝统一文化的手段是向全国推广“秦法”。由于当时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秦法与东方各地固有的传统习俗发生了冲突，其中尤以秦、楚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楚人在推翻秦朝的战争中充当了主力，不仅因为他们有反秦的实力，也因为他们对秦朝的统治更加反感。东方人“苦秦”主要是苦于律令刑罚太苛，楚人苦之特甚则是由于秦法与楚俗之间存在更大差异。这些事实后来因“天下苦秦”之说的流行而被人们遗忘了，但汉初统治者对之是有清醒认识的。这不仅影响了汉初东方政策的制定，也造成了汉代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的源于东方社会的“反秦”思潮。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秦朝的灭亡主要是因为其统治过于残暴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只是希望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对这一事实作进一步说明，以揭示秦亡汉兴的政治文化背景，也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一个视角。

一、说“取与守不同术”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多次出巡，所到之处，往往刻石颂功。其中六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① 这些文字盛赞了秦始皇即位后的各项文治武功，不仅涉及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更对秦统一后所采取的各项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效果大加渲染。其间充满夸张誉美之词，并非对秦政的客观描述，但也反映出始皇君臣为治理这一庞大帝国而提出的预期目标，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方针政策。

六篇刻辞中，以成文最晚的会稽刻辞内容最为完整。现抄录如下：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猗，杀之无罪，男秉义称。妻

^① 秦始皇刻石共七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其六，唯不载邹峰山刻石。今西安碑林藏有一块《峰山刻石》，《金石录》等后代金石著作皆著录之。但此系宋人据摹本重刻，其可靠性难以确定。参阅雒长安：《秦“峰山刻石”》，《文博》1984年第2期。

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前四句说的是撰写刻辞的原因。其中“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说的是秦始皇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统一天下的功绩。对此，泰山刻石概括为“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强调了法令的统一。琅邪刻石说得更清楚：“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第五句以下是对秦朝统一天下的全部过程的描述，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其一，自“秦圣临国”至“遂起祸殃”，说的是秦始皇即位后“定刑名”、“陈旧章”、“立恒常”，强化秦国法制，之罘刻石作“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东观刻石作“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政治最为清明的国家。与此同时，六国之君却“贪戾傲猛”，“暴虐恣行”，之罘刻石作“六国开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使关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盼望着秦之“大圣”前来拯救。

其二，“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一句，说的是秦灭六国，完成了军事和政治的统一，结束了六国的暴政。之

果刻石作：“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燁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东观刻石作：“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碣石刻石作：“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

其三，自“圣德广密”至“嘉保太平”，说的是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法制，扬善除恶，移风易俗，从而实现了天下“太平”的目标。对此，泰山刻石曰：“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之果刻石曰：“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东观刻石曰：“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碣石刻石作：“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徯，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琅邪刻石说的最为详细：“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转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富，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

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最后，“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一句，说的是“太平”局面巩固之后，始皇子孙只要坚持秦之法度，便可长治久安，二世、三世，以至无穷。泰山刻石作：“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东观刻石作：“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案“太平”又作“泰平”、“大平”、“至平”等，是战国以来形成的并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庄子·天道》篇：“太平，治之至矣。”《荀子·君道》篇：“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

前述第三阶段集中描述了始皇君臣心目中的“太平”景象，其中除了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之外，更有朝廷“端平法度”、“匡饬异俗”，而百姓“驩欣奉教”、“皆遵度轨”的一面。上古社会，部落林立，风俗各异。及至战国时代，“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淮南子·览冥》）仍存在若干文化区，其影响延及秦汉。^① 吕思勉先生指出：“自分立进于

^① 李学勤将东周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见氏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1~12页。卢云把西汉分为十一个文化区。见氏著《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85页。王子今把秦汉分为十二个文化区。见氏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统一，各地方之风气，必自异而渐即于同，此同化之实也。^①

统一的管理需要统一的文化。因而移风易俗是秦统一全国后所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任务。事实告诉我们，秦朝在第二阶段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第三阶段没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统一战争，二十八年便扬言天下太平，于是东巡郡县，登封泰山，刻石颂功，求仙人不死之药。秦始皇下令坑儒时说，“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即指上述举动而言。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知道天下并未太平。三十四年，李斯建议焚书时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始皇坑儒，太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巡行郡县，除了粉饰太平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向东方臣民显示威力。秦二世曾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现在他即位了，“黔首未集附”，“不巡行，即见弱”，于是也学其父的样子，东行郡县，刻石颂功。^②

刻石所言“大治濯俗，天下承风”，“黔首修洁，人乐同则”，“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云云，只是始皇君臣希望见到却没能见到的“太平”景象。第三阶段的任务既未完成，第四阶段当然也就没有出现。相反，人们看到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惨剧。

秦朝为什么没能完成第三阶段的任务？对这一问题，汉初诸儒进行过分析。《史记·陆贾列传》载：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9页。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这是汉朝建立后，第一次对秦朝灭亡原因作系统总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逆取顺守”之说。“逆取”谓以武力取天下，“顺守”谓以文德守天下。古者兵、刑不分，用“武”便是“任刑法”。秦政的特点是“任刑法”，而秦之“所以失天下”，在陆贾看来，不是由于“并天下”以前“任刑法”，而是“已并天下”之后“任刑法不变”。他还断言，如果秦统一天下之后，偃武而兴文，“行仁义，法先圣”，就不会发生二世而亡的惨剧，也就不会有汉朝的建立。由此看来，陆贾对励行法治的秦政并非一概否定，而是将未并天下之前和已并天下之后区分开来，未并天下之前“任刑法”无可厚非，近乎汤武之“逆取”，已并天下之后继续“任刑法”，则违背了汤武“顺守”的原则，是秦朝统治不能长久的真正原因。

今本《新语·无为》篇对秦统一后的政策有一段概括的评述，其辞曰：“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斂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此数事应当就是陆贾所说“秦任刑法不变”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些做法何以导致了秦

朝的灭亡？《无为》篇接着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言语间颇有些道家意味，长者风度。而与陆贾同时的叔孙通则对刘邦说：“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① 同样只是对秦以“刑法”守天下持否定态度，主张用儒术取而代之。

其后贾谊作《过秦论》^②，曰：“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而秦朝之所以亡，是因为“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末句《史记·秦始皇本纪》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文意较足。其意与陆贾“逆取顺守”之说完全相同，只是在说到“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的具体内容时，指责秦始皇非但不偃武兴文，反而变本加厉，“废王道而立私爱，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字里行间多了几分儒生的义愤。及至董仲舒批评秦政之失，既无“逆取顺守”之说，亦无统一前后之分，直曰：“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颡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又曰：先王皆以仁义治天下，“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③。又曰：秦之“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④，等等。不仅义愤填膺，且多夸张之辞。所谓“独不能改”不是指不改“逆取”

《史记·叔孙通列传》。

② 见贾谊《新书》。本书所引《新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贾谊集》本。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汉书·食货志》。

之术，而是继承周末乱政并将其推向极端。这里，秦的“取”、“守”之术都被否定了。

汉初诸儒总结秦政得失，皆以成败论英雄。然而，秦自孝公以来励行法治、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即使以成败论，这一成就也是无法否定的。秦政之失不在“取”，而在“守”。在这一点上，陆贾的看法较为客观，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应当和他生当秦汉之际，亲身经历秦朝的统治，且亲眼目睹了秦亡汉兴的全过程有关。而对贾谊、董仲舒来说，秦政已是传闻中事，难免添枝加叶，掺入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但在秦朝“已并天下”之后继续“任刑法”这一问题上，陆贾之说也很笼统，未作更具体的分析。事实上，秦所以未能“守”住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主要原因在于用武力手段完成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未能成功地用法律手段实现文化的统一与整合。^①

二、“天下苦秦”辨

秦朝“守天下”的失败究竟败在何处？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须从秦末那场反秦战争谈起。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陈胜起兵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向，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贾谊在《过秦论》中则说：秦统一天下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使得“天下苦之”，结果，陈胜“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②。

“天下苦秦”是秦末战乱中颇为流行的一句鼓动反秦的口

① 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23页。

②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号。陈胜于大泽乡起事时，分析过成功的可能性，认为“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①。此后，这一口号每每被起义将领用来证明反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张楚将军武臣谓赵地豪杰曰：“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高祖本纪》载刘邦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酈生列传》载刘邦谓酈食其曰：“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淮阴侯列传》：项羽使盱眙人武涉说韩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时关中并未发生反秦暴动，《始皇本纪》言“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是比较确切的描述，“天下苦秦”则有夸张之嫌。二是喊出“天下苦秦”口号的陈胜、武臣、刘邦等人皆为楚军将领，而楚人正是当时反秦的主力。这说明“苦秦”最甚者其实是楚人，“山东郡县”尚不能准确揭示这一事实，“天下”云云更进一步将其掩盖起来。

《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语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艺文志》有《南公》三十一篇，在阴阳家。亡秦者楚，又被历史所证实。于是后世史家对南公此说多有附会，或云南公“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②，或云三户乃地名，项羽于三户一带“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讖”^③。其实，观范增之意，南公断言“亡秦必楚”，是因为楚人对秦灭其国最为不满。《史记集解》引臣瓚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此说较为平实。然而“楚人怨秦”未必全因楚国无罪而亡及其对楚怀王的怜悯，其

① 《汉书·陈胜传》。

② 《史记正义·项羽本纪》引虞喜《志林》语。

③ 《史记正义·项羽本纪》语。

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楚人之所以充当了反秦的主力，田余庆先生《说张楚》^①一文认为：“战国晚年，楚国军事力量虽已就衰，但在关东六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前 260 年秦赵长平战役之后，六国中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的，只有楚。秦灭楚，经过了较久的艰苦战争。楚被灭后，潜力还在。所以陈胜一呼而楚境震动，关东沸腾，张楚所具有的号召力量，其他关东五国都无法比拟。”进而提出“非张楚不能灭秦”的结论。笔者同意这一分析，但还想补充一点：“非张楚不能灭秦”，不仅因为楚人有反秦的实力，也因为楚人对秦朝的统治更加反感。楚人反秦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其他地区，便是最好的证明。请看以下事实：

首先，楚人反秦表现出鲜明的自发性。《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即暴虐，楚人发难。”此处“楚人”指陈胜及所建张楚政权。是首事之功属于楚人。陈胜于大泽乡起事后，率众向西，先后攻下泗水郡之蕲、铚，砀郡之酈、谯，陈郡之苦、柘等城，发展为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万余人”的一支队伍，攻下陈郡郡治陈县后，被三老、豪杰推为张楚王。《陈涉世家》描述当时情形说：“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所谓“诸郡县”当指蕲至陈沿途及周围地区。陈胜在蕲，“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循蕲以东”，入陈后又“令汝阴人邓宗循九江郡”。葛婴向东南打到九江郡东城，立楚国旧贵族襄强为楚王，后得知陈胜已称王，乃杀襄强还报，被陈胜所杀。邓宗南循，不知下落如何，葛婴东循的具体情况也不见记载，可能都是有征无战，像西进的陈胜主力一

^① 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又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

样，得到沿途各城的响应。陈胜称王后，“陵人秦嘉、铄人董继、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其中陵县属东海，铄、符离、取虑、徐皆属泗水。他们起兵后，向东发展，攻打东海郡治郯城。陈胜得知后，派武平君畔前往“监郯下军”，但秦嘉“恶属武平君”，自立为大司马，后又矫陈王命杀了武平君。陈胜败死后，秦嘉还立景驹为楚王，企图充当楚地反秦势力的盟主。这其实是在陈胜集团之外，起自楚地的又一支反秦队伍。此外，陈婴起东阳，刘邦起沛，项梁、项羽起江东，英布、蒲将军起江中，张良起下邳。无怪《陈涉世家》说：“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楚将武臣曾对赵地豪杰说：陈胜“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此话不免夸张，但大致反映出楚人普遍“怨秦”之情形。

其次，楚地百姓积极支持并参与反秦。陈胜、吴广等率先起事者皆闾左戍卒。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说“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武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却使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并最终推翻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贾谊的结论落在秦朝不施仁义上，是其儒家立场使然，不是历史学应有的客观结论。但陈胜首事集团多为下层百姓，则是事实。其后率众响应者多为楚地各郡县的豪杰人物，但若没有下层百姓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少数豪杰不可能掀起如此汹涌的反秦浪潮。汉武帝时，辩士徐乐曾对武帝讲过一番

“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道理。^①所谓“瓦解”指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贵族叛乱，因为得不到民众响应，很难成功。所谓“土崩”则指“秦之末世”，陈胜一呼“天下从风”，其原因在于“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民困、下怨，因而积极参与反秦，确是秦末楚地的真实情形。其中，又以东阳县最为典型。《史记·项羽本纪》载：“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陈胜起兵后，“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婴不敢，“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东阳县当时没有一个有足够影响和威望的豪杰人物来发动和主持反秦暴动，故“少年”起事后强推“素信谨”的小吏陈婴为首。楚地民众中这种激烈的反秦情绪，为陈胜、项羽、刘邦等楚地豪杰施展抱负与才干提供了舞台，楚军由此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反秦势力。钜鹿救赵之战，项羽所率楚军破釜沉舟，“呼声动天”，“无不一以当十”，充分表现出楚人的气势。^②陈胜、项羽、刘邦等正是凭借这种气势才成了反秦战争的核心人物。楚国旧贵族也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怀念故国，熟悉楚国的制度与文化传统”，对恢复楚官、楚爵等制度起了一定作用。^③其中襄强、景驹、楚怀王心还先后被立为楚王。但他们主要是用来号召楚人的傀儡，并未真正起到领袖的作用。

① 见《汉书·徐乐传》。

② 见《史记·项羽本纪》。

③ 见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再次，楚军上下皆以“亡秦”为己任，主要矛头始终指向咸阳。陈县父老赞陈胜“伐无道，诛暴秦”，陈婴劝东阳少年“我倚名族，亡秦必矣”，都表现出楚人对秦朝的同仇敌忾。陈胜于陈县建楚称王后，一面遣军四出略地，一面派主力西向攻秦。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与秦朝争夺控制关东的这一最大据点，同时遣周文率军从函谷关方向“西击秦”，又“令钜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从南面夹击咸阳。周文一路收兵，“车千乘，卒数十万”，长驱入关，一直打到距咸阳仅百里左右的戏，后为秦将章邯所败。吴广久攻荥阳不下，部将田臧杀吴广而率精兵西进，亦为章邯所破。宋留攻南阳，得而复失，后降秦被杀。^① 由陈胜组织的这第一轮攻势失败后，项梁又组织了第二轮攻势。《史记·项羽本纪》载：陈胜失败后，其部将广陵人召平矫陈胜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途中得陈婴、英布、蒲将军、刘邦等率众加入，又兼并了秦嘉军，立楚怀王于淮水南岸的盱眙，自将大军转战胡陵、薛县一带。后北上救齐于东阿，大败秦将章邯，追至定陶，再破之。与此同时，派项羽、刘邦攻破城阳，又于濮阳、雍丘大破秦军，斩秦三川守李由。楚人的亡秦战争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但不久，秦朝“悉起兵益章邯”，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死，楚军对秦的第二轮攻势也失败了。此后，楚怀王移都彭城，刘邦、项羽等也收缩到彭城附近。章邯认为项梁军已破，“楚地兵不足忧”，遂引兵北上击赵。赵数请救于楚，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楚军主力北救赵，同时派刘邦“西略地入关”并与众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① 《史记·陈涉世家》。

项羽途中杀宋义自将，于钜鹿大败秦军，收降既而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给了秦王朝致命的一击。刘邦则乘项羽大战钜鹿之机，先行入关，迫使秦王子婴出降，终于完成了“亡秦”的使命。

齐、赵、燕、韩、魏等地也暴发了反秦战争，但激烈程度皆不如楚。

《史记·田儋列传》载：“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陈胜起兵王楚后，派周市略定魏地，欲攻狄县。田儋趁机杀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击退周市，略定齐地。其后不久，魏王咎被秦将章邯围于临济，田儋将兵往救，兵败被杀。儋从弟田荣率余众撤至东阿，又被章邯“追围之”。这时，“齐人闻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闲为将，以距诸侯”。项梁得知田荣被围，帅楚军往救，击破章邯军。章邯弃东阿西撤，项梁追之，而田荣却“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另立田儋之子田市为齐王，荣自为相，以弟田横为将。当时项梁数遣使至齐，要求田荣发兵共击章邯，而田荣不以灭秦为意，反以出兵助楚为条件，要挟楚杀掉在楚避难的田假、赵杀掉在赵避难的田角、田闲。楚、赵不听，田荣“终不肯出兵”。据《项羽本纪》载，项梁此时“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之；“项梁弗听”。不久；“秦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项梁兵败被杀，楚军受到沉重打击。项梁之败，轻秦也许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还是实力不足。秦军虽遭重创，但元气未伤。为了扭转关东局势，秦廷必然全力支援章邯。对此，项梁本人恐怕也很清楚，所以他在解了东阿之围后，“数使使趣（促）齐兵，欲与俱西”。定陶再破秦军后，他又派宋义“使于齐”，目的当是再次促齐发兵。宋义在途中遇

见往见项梁的齐使者，因预言项梁“军必败”，劝齐使者“徐行”以“免死”。宋义有此先见之明，一方面可能如《项羽本纪》所言是因为他看出项梁“有骄色”，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知道项梁实力不足，而关中援兵将至，促齐发兵已经来不及了。《田儋列传》说，由于田荣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进而又“围赵于钜鹿”，使反秦事业再次陷入危机，而项羽“由此怨田荣”。

可见，齐之反秦乃齐国旧贵族和齐地豪强乘乱复国的结果。其中，田假是秦统一前齐国最后一任君主田建的弟弟，是真正的齐国旧贵族。但他只是在田儋死后一度被“齐人”立为王，随后便被田荣赶走，在当时局势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田儋兄弟只是“故齐王田氏族”人，与齐王血统恐已疏远，但“皆豪，宗强，能得人”，是齐地著名豪强。他们之所以能在秦末战乱中乘机复齐，主要是凭借其豪强身份。除了田假、田儋两支贵族、豪强势力的活动外，我们看不到齐地下层社会有何积极反应。我们的印象是，齐人赞成反秦，但无意于亡秦，目的只是复国。故齐叛秦自立比赵、燕、魏、韩来得坚决，也来得顺利，但既不接受楚为纵长，亦不积极参与灭秦。这一现象恐不能全从田儋兄弟身上索解，齐地下层社会对反秦战争的态度应当是更为基本的原因。史称田儋兄弟“能得人”，这意味着他们熟悉齐人的心态，了解齐人的愿望。在秦末纷乱局面中，他们的抱负和行事应当是齐人意愿的反映。

秦末之赵、燕、魏、韩等国都是从楚派生而来的，是楚军略地的结果。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陈胜入陈后，全力向西，“务在入关”。魏之名士张耳、陈余当时逃亡在陈，劝陈胜“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陈余又自称“尝游赵，知其豪